

杭州文史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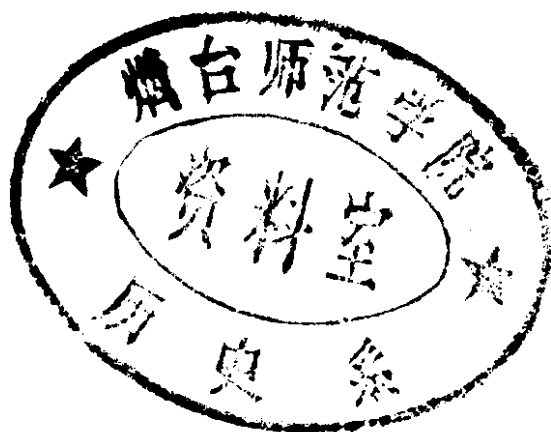
第七輯

杭州文史資料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H154/30
杭州文史资料

第七辑

(内部资料)



政协杭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七月

目 录

王平夷同志在杭州·····	赵信毅 (1)
回忆陈礼节·····	厉喬华 (9)
在和陈礼节同志共事的日子·····	董振舜 (18)
金润庠生平事略·····	金志朗 (20)
1926—1930年间中共在杭州天章绸厂的活动	
·····	马行健 (34)
铁窗风味·····	吴 昊 (39)
我知道的蒋、孔的三件事·····	宓 熙 (48)
杭州“荣誉市民”司徒雷登·····	汪坚心 (52)
1927—1949年杭州市的地方财政·····	吴益逊 (57)
1929年反对废止中医、中药的斗争	
·····	郑琴隐记述 裘诗庭整理 (67)
裘吉生先生从医五十六年·····	郑琴隐 裘诗庭 (86)
杭州市国民教育实验区概况·····	罗迪先 (91)
浙江省立五峰临时小学·····	孙一芬 (97)
杭州内河航运·····	严贵麟 (101)
六一织造厂·····	李之章 (107)
广合顺皮革鞋料号·····	吴炳坤口述 陈瑞芝整理 (117)

王平夷同志在杭州

赵信毅

王平夷同志是原中共浙江省委委员、杭州市委书记、杭州军分区第一政委、杭州市政协主席。他在“十年动乱”中被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残酷迫害致死，至今已快十六年了。但是，他为建设社会主义杭州而勤奋工作的形象，优秀忠诚的品质，艰苦踏实的作风，经常浮现在我的脑际，久久不能忘怀。

杭州解放，王平夷同志随军来杭工作，先后任杭州市军管会社会处副处长、市劳动局长。一九五三年六月，任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一九五五年六月，任市委第二书记。一九六二年起，到“十年动乱”初期，都任市委书记（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二年间，市委书记、市长是由省委常委、副省长吴宪同志兼任的）。因此，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内，王平夷同志实际上主持市委的全面工作，为改造旧杭州，建设“新天堂”而日夜操劳，贡献力量。

我是一九五四年借调到市委起草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文件时开始认识王平夷同志的。一九五五年我从市委宣传部调市委办公室，从此，就同他长期在一起工作。现在将我同王平夷同志直接接触的情况，写成这份材料。由于了解的情况有很大的局限性，时间又相隔很久，虽难免挂一漏万，但仍愿它能“窥斑”以见“全豹”。

王平夷同志 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他对党、对革命

很忠诚，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的指示，态度十分严肃。多年来，他总是白天处理紧张繁忙的公务，晚上认真学习。除了下乡和外出，在他的办公室，总是夜夜灯火通明，就是周末和节假日也很少例外。他不仅用心攻读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而且十分重视学习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指示和上级的重要文件，对其中的要点、警句，都用红铅笔划划圈圈，有的则加上旁注，务求深刻领会，融会贯通。对《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论十大关系》、《工作方法六十条》、农业四十条、工业七十条和刘少奇同志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基本要点和重要章句，他都能背诵出来。当然，他不是把这些当作教条和口号，而是把它和杭州的实际情况密切结合起来，确定工作的指导方针。凡是中央的重大问题决策和重要文件下达以后，他总是带动其他领导成员，一是认真学习讨论，领会精神实质；二是下去调查研究，摸清本市的具体情况，掌握干部群众的思想脉搏；三是在吃透两头的基礎上，提出贯彻执行的计划、办法，并提交市委常委会讨论补充、修正。由于坚持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因而能够从杭州的具体情况出发，较好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在贯彻党的八大路线和一九六〇年以后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他的带领和筹划下，杭州市采取了一系列扎实的措施，从而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在他主持市委工作的十多年中，虽然由于来自上面的“左”的影响，也曾经有过一些失误和挫折，但是总的说来，市委的工作是比较有生气的，杭州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有目

共睹的。党和党的领导人（包括王平夷同志等市领导）在群众中威信是比较高的。

王平夷同志有很强的责任感，时刻把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杭州，作为自己的光荣职责。他经常说，白居易、苏东坡在杭州当太守，为人民做了一点好事，杭州人民永远铭记他们。我们是社会主义时代的“太守”，功绩应该比他们高出十倍百倍才行；假如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不但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而且在九泉之下愧见白居易、苏东坡。党和人民也当然有权叫我们卸官交权。他永远记住自己的诺言，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满腔热情，不知疲倦地工作。他抓工作的特点是：善于总览全局，统筹安排。从思想政治工作到经济建设和文教科技工作，从城市工作到农村工作，从党的建设到群众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都认真研究，在突出重点的前提下，密切结合，切实抓好，决不顾此失彼。

对杭州工业的改造和发展，他倾注了很大精力，先后规划建成了艮山门、半山、江干、龙山、肖山等新的工业区；新建了制氧机、汽轮机、齿轮箱、锅炉、机床、轴承、发电设备、汽车发动机、电缆、电子管、杭丝联、化纤等一大批骨干工厂，使杭州的工业在原来“绸伞加剪刀”的十分薄弱的基础上，在六十年代就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其中不少工厂，从草拟设计任务书，到定点选址，建设施工，他都亲自过问，以至实地考察，具体指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六〇年杭州电子管厂的扩建和改造。当时，他不仅召集工业、计划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一起研究建厂方案，还请来了浙大的一位老师，多方求教，分析电

子工业对整个工业发展的深远影响，杭州发展电子工业的有利条件，并确定从试制哪些产品入手。还特地花一天多时间，到富阳鸡笼山麓和水星阁实地察看选择厂址。建厂方案确定后，布置我连夜向省委写了《关于建立无线电工业的报告》。以后这个厂发展比较顺利，和王平夷同志这种深入细致的作风是分不开的。

对农村工作，他也抓得很紧很实。经常下农村蹲点，调查研究。如一九六一年春，为了贯彻两次“郑州会议”精神，解决刮“五风”的后遗症，他和省委副书记霍士廉、省军区政委周贯五、余杭县委书记孔宪连等，一起到三墩公社西行大队蹲点一个多月，对实行“队为基础”以后，如何处理好土地、耕牛、农机具、鱼塘、桑园等十个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写出了调查报告，用以指导面上工作，从而促进了农村政策的落实和以后六十条的顺利贯彻。一九六三年，全市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他又在农业部门总结的基础上，主持编写了粮食、棉花、络麻等各种作物增产的经验，印成小册子，进行具体指导。

他对加强杭州的市政建设，改造旧城面貌，做好园林绿化等工作，作出了很大努力。在建国十周年前夕，在他直接指导下，本着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和连片改造的原则，完成了解放路、延安路两条大街的拓宽改造，初步改变了市区拥挤破烂的面貌。杭州是全国著名的风景城市，在当时旅游业还不被重视的情况下，他早就提出要把杭州建设成为“东方日内瓦”的目标以及发展方向，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和其他市委、市政府领导一起，逐个研究了花港

公园、柳浪闻莺公园、杭州植物园的建设和其他风景区如六公园、九里松的扩建。一九六〇年，亲自主持起草过杭州市园林绿化规划。一九七七年，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浙江日报》总编辑于冠西，曾在报上作诗，颂扬王平夷同志重视抓园林绿化，庇荫后人的政绩。王平夷同志还具体抓了市委大院的绿化。这个院子原是国民党党政机关的所在地。解放之初，池塘湮塞，假山毁圯，野蒿没胫，乱石成堆。五十年代初，市委、市政府机关迁到这里，王平夷同志提议把大院建成全市绿化的“窗口”。他意味深长地说：“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假如我们市委的院子都整治不好，何以能使全市工作有所建树呢？”在他和其他市委领导同志亲自指导下，经过具体规划，由领导同志带头，开展清石整地，植树造林活动，栽上水杉、雪松、龙柏、香樟、麻栎、玉兰，种上各种水果、花卉，以后又引进速生的泡桐、檫树。市委大院今天树木葱茏，鸟语花香，其中也凝结着王平夷同志的一份汗水。

王平夷同志对文教卫生、财政贸易、交通运输、新闻广播等各项工作，也都十分关心。为了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他曾到杭一中蹲点，“种试验田”，亲自听老师上课，与师生一起座谈，研究改进教学的具体措施。为使文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他的倡议下，建立了杭州文工团（后改名为杭州歌舞团）。对人民生活，他更是十分关心，市委常委会，经常讨论商业网点设置、市场安排、手工业生产和副食品、蔬菜、小商品供应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研究改进工作的意见。《杭州日报》，是他建

议创办的。对如何办好这张党报，操了很多心。他经常围绕上级的指示和市委的意图，组织秘书和编辑记者，撰写社论，用来教育群众，指导工作。不少重要社论，是他亲自修改定稿的。为了充分发挥报纸的教育、指导、激励、推动作用，还派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坐镇报社，亲自把关。因此，能把《杭州日报》办得有相当水平，并富有地方特色。

王平夷同志对政协、统战工作十分重视和关心。他经常说，统战对象中，有许多著名人士和学者专家，做好他们的工作，发挥他们的才智，不仅利于巩固政权，而且能促进建设事业。每当形势转折时期或有重大部署时，他总是召开政协常委会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传达上级指示，进行政策交底，分析杭州情况，谆谆诱导教育，把各种思想逐步统一到党的政策上来。他十分重视同民主人士、高级知识份子交朋友，不时找张承桢、姜礼钧（工业界）、刘开渠、崔东伯、王祖勋（教育界）、李容、李挺宜（医务界）、汤元炳、唐巽泽（工商界）等商量工作，交心谈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有的还保持通信联系，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在讨论制订工农业、文教科技、城市建设规划时，或在开展各种大检查中，都提议邀请浙大、杭大、农大、医大、工学院、美术学院的教授参加，听取学者专家的真知灼见。他十分重视贯彻中央关于安排党外人士担任教育领导并使他们有权有职的指示。从政治上、思想上关心非党副市长陈礼节同志，把他作为建党对象培养，工作上鼓励他放手去干，并给他支持帮助。杭女中非党校长袁心粲，思想进步，名望颇高，对气功等健身

之道很有研究，经他提议任命为市体委主任，工作上使他有职有权。

从以上列举的事例可以看出，王平夷同志是一个出色的领导者、组织者，善于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提纲挈领，把各方力量调动组织起来，把各项工作紧抓起来。同时，他又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家。他经常根据中央、省委指示的精神，密切结合干部群众的思想情况，作形势和任务的报告。由于报告既有理论，又有实际，抓住要领，深入剖析，因而很有说服力，能把上级的指示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他作报告，一般都不要秘书代劳起稿，而是自己开动机器，认真准备，包括学习文件，引证资料，召开必要的座谈会，然后拟好提纲，敞开思想去讲。所以他的报告有血有肉，没有八股味，没有陈词滥调。

对下级干部，尤其是秘书来说，王平夷同志是一位可敬而又严格的师长。在市委办公室，他明令禁止上班时间打扑克、走象棋，勉励大家要刻苦学习。除了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思想外，提倡以“十年寒窗”的精神博览群书，扩大知识面；提倡“磨穿铁砚”精神，勤于写作实践，不断提高写作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他还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尽量让秘书参加各种会议，阅读各种文件，抽时间到基层去“走马看花”或“下马看花”，掌握多方面的情况和资料。对秘书撰写的稿件，经常亲自修改。有些重要文稿，更是一再帮助研究，从内容、结构到文字，一一指出弊病所在，提出修改意见。因此，大家都感到王平夷同志是很好的师长，虽然要求严格，但对自己的帮助却很大。在他领导下工作，确实有所提高，有所长进。

虽然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给王平夷同志罗织了许多罪名。但是，“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杭州市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是有辨别是非的能力的。随着“四人帮”的跨台和揭、批、查的深入，王平夷同志的冤案终于得到了昭雪。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杭州市近两千名干部和群众，参加了王平夷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深切地悼念这位曾为杭州市社会主义事业作出建树的老书记。

王平夷同志在杭州工作了很长时间，历任中共杭州市委书记，杭州市政协主席等重要职务，对杭州市建树很多，政绩卓著。本辑发表了赵信毅同志的《王平夷同志在杭州》，从某些侧面记述了王平夷同志的事迹，是“三亲”材料。我们热切希望曾和王平夷同志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和亲友们，为我们积极提供这方面的史料。

编者

回忆陈礼节

厉商华

陈礼节同志，湖北省汉阳县人。1906年出生在蔡甸镇的一个农村穷裁缝家里。母亲是贫农的女儿，生有三女三男，礼节同志最小。礼节同志三岁时父亲去世，因家境清贫，过继给在汉口的二叔。二叔以洗衣为业，兄弟三人都投奔他家。不久二叔病故，二婶改嫁，大哥、二哥继承洗衣业。兄弟三人惨淡经营，生活仍很清苦，但已无寄人篱下之感了。大哥开始教礼节同志识字、读经文。九岁上私塾，十二岁进汉口辅义小学读书。辅义小学是一所为贫家子弟开办的免收学费的学校。十六岁小学毕业，名列第一。时适逢日本同文会在汉口开办汉口同文书院。礼节同志前去应试，竟被录取在第一班。大哥见小弟资质聪颖，学习刻苦，把改换门庭，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兄弟节衣缩食，勉力维持礼节同志读书。这时，汉口的工人运动蓬勃开展，民主革命思潮席卷全国。礼节同志幼年的境遇，使他同情革命，向往一个人人有书读，人人有工做，不受屈辱的社会。1923年2月7日，军阀吴佩孚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杀害工人领袖施洋、林祥谦等。面对军阀的暴行，礼节同志非常愤懑。但他深知今日得能上学读书，非常不容易，只得将不平深埋在心中，更加奋发读书。1926年，他从同文书院毕业，因学习成绩优秀，同文书院用庚子赔款选送他去日本深造。时礼

礼节同志二十岁。

在日本他考取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日本人在中国办学，选送留学生，用意都在于从中国人中培植亲日分子，为进一步侵略中国服务。礼节同志到日本后，看到中国人在日本备受朝野的歧视、凌辱，是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所不能忍受的。礼节同志认识到，军阀混战，贪官污吏当道，政治腐败，民不聊生，这些内忧，正是引起外患的根源。因此，礼节同志不为“中日亲善”、“同文同种”的宣传所动，不为侵略者所用，反而激起他的爱国心，发奋读书。1932年从第一高等学校毕业，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这时，日本左翼运动蓬勃发展，礼节同志也参加日本左翼友人组织的秘密读书会，读过《赤旗报》，用节衣缩食下来的钱，捐助秘密组织。1933年日本当局逮捕中国留学生中的共产党人，同学方翰（又名方天一、王达夫）被捕。为营救方翰同志，礼节同志延请律师，奔走于大使馆和监狱间，费时一年半才获释。方君随即被日方遣送返国。四十年后，才知方翰同志就是任湖北省委统战部长的何定华。1936年礼节同志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留任该校医学部真下内科教研室，继续研究内科，专攻博士学位。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制造芦沟桥事件，悍然发动侵华战争。礼节同志报国心切，于同年11月毅然放弃研究回到上海。

抗战军兴，正需要大量医务人员，礼节同志认为自己的所学，正可为国出力。岂知反动政府不惜高价礼聘外国医生，而对回国的青年医务工作者，却冷漠相待。礼节同志虽经多方奔走，谋一职而不能得。满腔热血，竟然报效无

门！不得已辗转到了香港。时北平的几所大学迁址陕西汉中城周一带，成立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该校校长徐诵明先生，接受留日同学陈方之先生的推荐，聘礼节同志为国立西北联大医学院内科教授。1938年5月，他从武汉到陕西南郑西北联大医学院工作。

礼节同志以为从此可以献身祖国的医学事业，为国家多培养医药人才出力了。殊不知国内派系林立，蒋介石对高等学校思想控制很严，堂堂学府，也勾心斗角，经常挑起事端，干扰学习研究。对此，他十分失望。1939年夏，教育部长陈立夫，强调党化教育，屡次授意徐诵明解聘法商学院的左翼教授。徐氏不听，陈派张北海出任法商学院院长。张到任后大事笼络反动落后师生，排挤打击左翼进步人士，激发了反张的斗争，发传单，罢教罢课。蒋、陈即以西北联大“赤化”为名，下令改组，分设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徐诵明免职，解聘左翼教授。正义人士，同声愤慨。礼节同志和老教授蹇先器先生等，采取“不屑为伍”的不合作态度，于1939年8月离开西北联大。

我和礼节同志是在西北联大的同事。当时他是内科教授，我是讲师。1939年1月由校长徐诵明先生主婚，我们在陕西南郑结婚。同年8月，我们一起离开西北联大到成都悬壶自给。1940年1月长女陈智周出世（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副研究员）。同年4月，受福建医学院院长侯宗濂之聘，经重庆、宜昌、长沙、曲江、赣州、瑞金来到福建沙县。礼节同志任教授兼附属医院内科主任，我任副教授兼附属医院小儿科主任。沙县地近抗日前线，

经常有敌机空袭，生活极为清苦。英美派医师自视甚高，自树门墙，不愿前来受罪。虽然如此，由于我们经年颠沛，竟然安土重迁，一住六载，亲手送走了七届毕业生。

在这段时间里，我俩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教学、临床、科研上。1942年我升为教授。礼节同志通晓日、德、英文字，先后写出二百万字的《传染病学》讲义，五篇学术论文，其中四篇获甲级奖，一篇获学术奖。目前福建省医学界的教授、院长、主任，有不少是我们当时的学生，至今仍有书信往还。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光复，陈仪氏出任台湾行政长官，电邀礼节同志赴台工作。是年12月，出任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兼第二附属医院（红十字医院）院长。1946年6月兼热带病医学研究所所长。12月第二附属医院改为台北医院，改兼第一附属医院院长。第一附属医院设备完善，有800张病床。1946年11月，热带病研究所移交洪式闾先生长管。1947年1月，又兼任结核病研究所所长，研究治疗肺结核左旋性洛丁酸。

礼节同志以教授身分接收台湾大学的两个附属医院、两个研究所时，不带去一个私人，团结依靠原有的台湾籍教授、医师、护士和行政人员工作。特别是清点日本人移交的物资，不分贵贱，悉造具清册，涓滴归公，无一遗漏。附属第一医院被美国飞机炸毁，经礼节主持修复。这些都深得台湾教育界、医学界人士的称道。

1948年7月，朱家骅出任教育部长，台大校长易人。我们感到台湾情况复杂，举目无亲，万一失业，不堪设想。适陈仪氏改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来电相邀，乃于7月

辞职，8月来杭。礼节同志接任省立杭州医院院长，兼浙江医学院教授。

那时，全国的民主运动如火如荼，反动派惶惶不可终日，形势动荡，物价暴涨，民不聊生。每到夜深人静，我们就要收听解放区的广播。认识解放大势，力不可挡，企望早日解放。大约是1949年3月底4月初，国民党卫生处长下达省主席周 焄“把杭州医院迁往宁波、舟山”的命令。他对礼节同志说：“我们就要走了，你快作准备，把重要设备和人员都带走！”在这一历史性的关键时刻，礼节同志毅然决然地抛弃为蒋家王朝殉葬的道路，迎接解放。他一面对周的命令拖延不办，一面动员医院医职人员，安心工作，严防肖小盗窃破坏。礼节同志得知城站红楼有一批美援医疗器械、药物，反动派决定要把它烧毁。他对我说：“这些物资应该留给人民，决不能让他们毁掉！”他舍命和医院的职工，抢出一百八十多箱医药物资。解放后全部由医院军代表验收，供解放军伤病员治疗上应用。

1949年5月3日，礼节同志和浙江省立杭州医院的全体医护人员，用认真负责紧张的治疗、护理，为解放战争流血的伤病员的实际行动迎了解放。

当时医院只有60张床位，礼节同志依靠全院的医护人员，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到300张。使不少伤病员，得以及时治疗。不少人治愈后重返前线。那时护士很少，为此在医院内开办护士学校，自己培养护士。

1950年初，礼节同志调任杭州市卫生局副局长，后任局长。这时他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的方针、政

策，学习政治时事，联系自己的思想，系统地读了马恩列斯著作，写下许多学习心得笔记，努力提高觉悟。礼节同志团结卫生界的同志，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卫生工作四大原则：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由于礼节同志忠守党的政策方针，团结群众，在较短的时期里，取得较大的成绩：基本上控制了天花、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协助厂矿建立卫生医疗机构，对职业病，如缫丝工人手指溃烂等作了研究治疗；在郊区农村实行巡回医疗；安排劳动保护和公费医疗；举办西医学习中医学习班。抗美援朝时期，礼节同志响应党的“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号召，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组织救护队，开展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他作为红十字会杭州分会会长，曾组织了三批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

1955年礼节同志当选为杭州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方面工作。

在卫生工作方面，他以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为重点。他认为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结合是毛泽东思想在卫生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是在我国一穷二白的条件下迅速改变卫生落后面貌，预防和消灭疾病，保护人民健康的根本途径。它有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伟大意义，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一个创举。礼节同志深知责任重大，全力以赴，事必躬亲，不稍怠懈。当时，医务界有人认为卫生医务工作搞群众运动“不科学”，对爱国卫生运动不以为然；也有人认为象礼节同志这样的教授专家，去打苍蝇，捞子子，捉老鼠，挖窖井，掏粪坑，“太不值得”。礼节同志力排